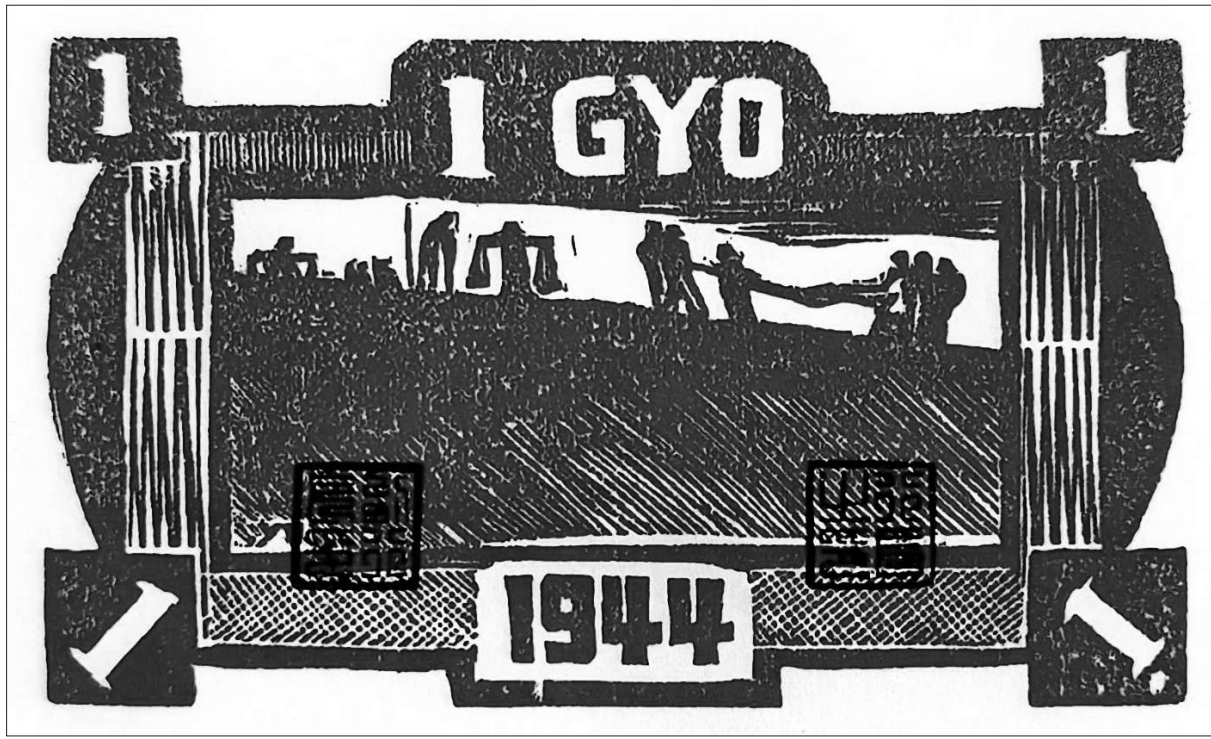


特殊的大江银行“一角票”

李传玺



这张特殊的“一角票”，正面图案是浩瀚的大江，有船扬帆驶过，江岸上一座巍峨的灯塔，正放射出两道巨大的光柱，刺破无边的暗夜；背面图案，高大的江堤上，人们正在紧张地修筑，有六人正在抬夯，一人正挑土走上大堤，一人正在平复堤面，另有两人似乎正从堤下挑土上来；图案四角上面两角正刻着“1”，下面两角斜刻着“1”，图案上方正中刻着“1”以及当时“角”的拼音文字“GYO”，下面正中刻着发行年份，图案上盖着行长和副行长的印章。

大江银行

大江银行是皖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无为游击纵队、皖南事变突围到皖中的部队和其他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在中央党校学习未到期，由政委曾希圣一肩挑。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从1932年秋红军首破敌军密码算起，到1936年红军会师，共破译了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种之多，仅长征期间就破译当面之敌177本密码。

此时的曾希圣狠抓皖江根据地抗敌斗争和民生建设。至抗战结束，皖江根据地建立了3个专员公署、14个县抗日民主政权，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全师也由开始的2000多人发展到3万多人，武器是全日式装备。

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让根据地军民很尴尬的事情。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虽然红红火火，但老百姓生活贸易交往过程中使用的不是国民政府的“法币”，就是汪精卫伪政权发行的储备票、军用券等，这不仅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改善提高，也严重影响根据地巩固发展的信心。根据地中心地带是无为等滨江地区，自古即是鱼米之乡，对岸是长江水运重要港口的芜湖，此时被日伪占据着。日伪便利军用券储备票来根据地套购，骗取各种物资，使根据地军民遭受无法估计的损失。为此，新四军军部要求各根据地建立自己

的银行和印钞厂。1943年6月，皖中行政公署决定成立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

发行大江币，首先要能印出大江币。此时根据地一方面指示七师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盛菜莱设法招聘印刷工人，采购印钞机械等物资（后招聘到65人到皖江根据地，并通过中华书局过雪川等人按汪伪的“储备票式样”，将伍元、壹元、伍角、贰角、一角等五种票面的“原版”，包括正背面十块版子的石头和十块花边内的地纹版带到根据地）。但这毕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因此，根据地另一方面又采取权宜之计，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先印刷简单的纸币以救急。

特殊的“木刻”

如何先印刷简单的纸币，大家都想到了木刻——木刻是中国绘画传统印刷形式，当时根据地在宣传方面，由于没有照相机，也通常采用木刻艺术来展示宣传根据地军民生产战斗的情景，因而木刻艺术家大有人在。

当时皖江根据地的吴耘就是其中之一。他1940年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新四军推进纵队驻地服务团美术组长、第

七师政治部文工团美术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漫画》杂志编委、中国美术馆展览陈列部副主任等。

大江银行负责人找到吴耘，请他用木刻方式来刻制大江银行的纸币图案。吴耘一听，非常高兴。木刻艺术不仅能在抗战斗争中发挥宣传作用，现在还能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作用，一定要好好刻制。

他选用了较为坚硬的梨木和枣木作板，“当时我用的木刻刀，大部分是自己造的。有的利用旧钟的发条改制的，有的是用自行车轮子上的钢丝缠成的。为了刻制抗币，把这些简陋的刀子都磨得十分锋利”，而画面必须以根据地军民生产的情景为主体。

由此，这张“一角票”展现出来了特别的风采。

其票面画面完全是吴耘的木刻作品，充分体现了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因地制宜的创新精神，和广大革命艺术家从斗争形势需要，用作品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自觉情怀。

吴耘保存了一部分手拓木刻钞票的版样。他后来回忆，那些画面“可以看到根据地军民合作奋勇抗击敌人、老百姓欢庆胜利、慰劳新四军的画面，可以看到皖中人民努力生产、兴修水利、建

筑水闸和修建长江堤坝的情景。还有一座灯塔，则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背面“修建长江堤坝”的情景恰恰记述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大壮举：抗日战争时期最大水利工程黄丝滩长江大江堤的修筑。此段大堤在夏天洪水季节常常崩塌，然后横扫无为、和县、含山、巢县、庐江等地，甚至冲过巢湖直达舒城和合肥。洪水所过之处，这些地方的洼地尽成泽国，人民惨遭浩劫。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皖江根据地区域。必须根除这一水患，保障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43年11月底到1944年5月初，时任皖中行署主任吕惠生主持修建了黄丝滩大江堤工程。江堤从三支笔到新垅头，全长7.25公里，高2丈，底宽12丈，动用民工21万人。前不久，当笔者去拍摄这段江堤的图片时，对修筑情景记忆犹新的老人仍然动情地说：“那时，天一亮，太阳还没出，民工就自觉上坝顶，打夯的打夯，挑土的挑土，没有谁偷奸耍滑，都知道那是共产党在为老百姓做事。”这一大堤至今仍惠及着以上地区的人民。

这就是大江银行起初“一角票”的特殊所在。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



品楹联忆先贤

——顾炎武故居楹联欣赏

叶玲飞

顾炎武故居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经过多次重建和修葺，成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站在白石楼前，一副楹联甚是大气：“春酒绿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此联将笔者拉回顾炎武潜心读书的幼年时期。顾炎武出生于江南世家，嗣母王氏未婚守节、刚毅节烈，白天纺织、晚上读书，并以于谦、方孝孺等忠臣义士的故事教导顾炎武。对联描绘了母子朝夕相伴、涵养学识的美好场景，这段时光奠定了顾炎武深厚的学养，更对其政治态度、求实学风的形式大有裨益。

到了亭林祠，一副楹联映入眼帘：“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志，以待后学。”带笔者步入顾炎武投身抗清的青年时期。1645年，清军攻陷昆山，嗣母王氏幸免于难，但却不愿苟活于世，绝食15日殉国，并留下遗训：“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也。”王氏的忠诚气节、民族大义深深影响了顾炎武的人生观、价值观，彻底改变了顾炎武的人生轨迹。此后，顾炎武背负着国恨家仇，往来于长江南北，奔走抗清，兑现了“遗民犹有一人存”的铮铮誓言。

在正厅两楹，悬挂着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带笔者走进顾炎武游学北方的中年时期。抗清失败后，顾炎武变卖家产，开始了北游生涯。“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顾炎武在北方游历甚广，先后到过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在山东章丘，被田庄庄主谢长吉“坑骗

千金”，陷入“黄培诗案”。下联中的“风雨”，意指人世间的险恶与危险。当处于人生低谷时，内心会孤独、悲凉、彷徨，这时如有故人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此楹联张挂于清厅（轿厅）的抱柱上，非常醒目，它带我们重回顾炎武终成大儒的暮年时期。对联中的“文章老”“学问深”指的是顾炎武著述丰富、学识深厚。顾炎武一生勤于著述，对金石考古、国家典制、郡邑掌故、水利河漕等都有深入研究，完成了《日知录》三十二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音学五书》三十八卷，成为一代旷世大儒，形成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宗旨和实学纲领。

走到门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楹联振聋发聩，它贯穿于顾炎武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这句传世名言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认为“国”指的是王朝，而“天下”则是指道德、风俗、文化。顾炎武深信“保天下”比“保国”更重要，入清之初，他投笔从戎，武装抗清；北游之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逐渐从“一姓之忠”的“保国”转向了“保天下”。

观故居读人生，品楹联忆先贤。“宜而子孙位位公金母，交于兄弟才华季虎头龙。”先生心中的大道、大任、大节、大爱，先生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人格风范，一直都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中共昆山区委党校)

“百位大师风采特展”亮相国博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百年巨匠 百年史诗——百位大师风采特展”在国家博物馆举行。

此次特展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阵容强大，百位巨匠的展品按主题篇章分别展陈于国家博物馆两个展厅。其中，以“笔墨精神”和“自铸伟辞”两大篇章，铺陈出美术书法篇和文学篇的32位历史人物。另一个展厅的展示内容分为四个篇

章：“锵金铿玉”篇依次展出《百年巨匠》戏曲篇、戏剧篇、曲艺篇以及音乐篇共计27位历史人物；“培根铸魂”篇将视角对准《百年巨匠》教育篇、国学篇和体育篇的14位历史人物；“功勋百代”篇展出百年来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建筑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取得杰出成就的11位历史人物；在“妙手仁心”篇中，展现了京城4位名医的风采。



元代青釉弦纹三足炉

元代青釉弦纹三足炉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元代青釉弦纹三足炉，出土于江苏省太仓市樊村窑遗址，其施粉青釉，釉色莹润淡雅，体现出文人士大夫的复古追求以及崇尚清雅的艺术品位。

筒式炉是宋至明代流行的一种炉式。此炉器型端庄秀巧，釉色莹润淡雅，体现出文人士大夫的复古追求以及崇尚清雅的艺术品位。

漫谈近代龙泉仿古青瓷烧制

陈小龙

近代龙泉仿古青瓷的烧制缘起古窑址、古墓葬的发掘，这似乎已成共识。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德国传教士奔德在龙泉购地垦种时发现古瓷，龙泉青瓷名声初显，日本、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收罗青瓷，例如宣统二年（1910），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人日本人行原始平至大窑，与村民合作挖掘，此后长达数十年。国内大批古董商闻讯也接踵而来，加之民国初知事杨毓琦抛开严禁发掘坟墓的军法，准许开墓园，并亲往巡视，导致大量古窑址、古墓葬被盗挖一空。古瓷大都行销沪上大都市，富家之家耗费巨资购置正品以示身价，普通人则买个次品或仿品把玩以充风雅。古瓷丰厚的利润，驱使龙泉民间开始秘密研制仿古青瓷产品。

“邑人廖献忠首谋仿古，几可乱真，是为近代仿古之嚆矢……”民国龙泉县长徐渊若在专著《哥窑与弟窑》中

这样定论。光绪二十八年（1902），廖献忠与吴井兰至大窑发动村民在叶坞底采掘出一种钢筋炉，由吴井兰购去。之后他又频频到大窑古窑址寻找历代青瓷残片，在自家作坊进行反复试验，还曾在龙泉巨商赵道生于城区桃源山上修建的龙窑中烧制仿弟窑型器皿，终于获得青瓷釉料配方和烧制工艺。

廖献忠仿制的古瓷，无论是“晶莹之色”还是“绿翠之形”，都可乱真，一时名闻遐迩，并因此陷入一场官司。1918年9月，龙泉县大通和银行当手（经理）季克明一纸诉状将其告到了县公署，称大沙张锡妹、城东张水清先后将5件仿制的假古瓷托名为宋代大窑古瓷，哄骗季克明以250元全数买下，后季克明察觉是假货，无法转售，于是控告张锡妹、张水清以及制瓷艺人廖献忠串通诈骗。性格耿介的廖献忠在应诉状中自陈虽然生活窘迫，却安贫乐道。

仿制大窑古瓷是为生活所迫，但明仿明卖，并无欺诈。后浙江省长公署和省实业厅分别签署训令和指令，要求龙泉县公署查明实情，并指出仿古和伪造不同，若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青瓷，理应保护。最后知事撤销该案，牌示廖献忠领回被缴瓷器，廖献忠以“瓷被更换”为由，不愿领回，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在《龙泉访古记》中谈及龙泉仿古青瓷时则另持一说：“据说溪头李某最好，竟可乱真。八都之刘马德亦在溪头烧过，廖氏尚在其次。”李某谓谁，语焉不详。据《龙泉民国档案辑要》一书记载，1943年陈佐汉邀本乡瓷工李君义、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龚庆芳、许家溪等制瓷高手，在溪头组织仿古青瓷研制小组。凭此推断，李某当指李君义。其实，更应关注仿古青瓷研究的组织者和推动者陈佐汉。在宝溪乡

长任上，陈佐汉召集当地制瓷高手开展仿古青瓷的研究，庇护这些人免于被抓去当壮丁服兵役，这也得到了县长徐渊若的默许。《哥窑与弟窑》中记载了此事：“宝溪乡龚庆芳兄弟以及张高礼、张高乐等六人，以仿古著名，其制品甚精致。曾以恢复固有艺术，系属专门技术人员为词，申请缓招。余亦恐邑人仿古名手，日趋凋零，颇有同情之意，为请于上峰，奉批格于条例，碍难照准。今日已否从戎，尚未探知。”

仿制古青瓷的场所就设在溪头村陈家大院的前厅，置有相关设备。陈佐汉聘请的仿制青瓷的主要技师是张照坤、李怀川，后又从云和县请来雕塑技师彭益陶，专做仿古青瓷器型的雕塑。另腾出自家的一间旧房略加修整，命名为“古欢室”，作用近似如今的研究室。

陈佐汉仿制的古青瓷，种类繁多，大致有凤耳瓶、云鹤盆、双鱼盘、金鱼缸、双鱼洗、双鱼碟、鸳鸯洗、牡丹瓶、高炉、鱼篓瓶、印盒、龙虎瓶、桃洗、五嘴瓶、观音佛像等数十种。徐渊若盛赞：“陈佐汉氏等所制仿铁骨，有时颇可混珠，若用药去其新光，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则好古者易于上钩。”

仿古青瓷“绝精妙”，常人很难识破。即便学识渊博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哥窑与弟窑》中记录了这样一桩趣事：龙泉的古商吴子忠，受战时寓居龙泉的知名瓷器鉴赏家金石寿指点，仿制的古陶器纹款色泽，咄咄逼真。曾仿晋代式样，制成陶器数件，至浙大龙泉分校求学。各教授见其古趣盎然，纷纷考证年代，度量分寸，辩论款式，交口赞许，顷刻售罄。

仿古青瓷的烧制颇为不易，“出窑时烧损极多，甚有全窑毁坏，什中得成六七，已属大幸……”花费精力和代价之大，个中滋味旁人难以体会。所以众多仿古能手，对制瓷原料、釉色这些独门技艺，都严守秘密，从不轻易透露。日本人也有仿龙泉窑的作品叫七官手，沪上称为老东洋，以鼎炉等式样为多，所仿钢筋炉也很可观。其颜色将颜料掺入釉内，不像我国外青釉料之能天然发绿，且略带黄色，质轻，火度不高，击之无音，露胎处发灰色，一望可辨。可见，龙泉窑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精髓，外人是很难掌握的。

(作者系浙江省龙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



位于宝溪溪头村的民国时期龙泉窑